

周有光:105岁的新潮老头

今年105岁的周有光生于清朝光绪年间,经历了晚清、北洋、国民党政府和新中国四个时期,有人戏称他是“四朝元老”。他的一生充满传奇色彩,早年专攻经济学,50岁才半路出家,转行研究语言文字学,参与设计“汉语拼音方案”,被誉为汉语拼音创始人之一。他又被称为“新潮老头”,虽已百岁高龄,每天还要看书读报,至今仍勤于笔耕,喝“星巴克”咖啡,看电影大片。



伉俪情深 (资料图片)

1 现状

百岁老人不落伍

经历了百年风云,如今的周有光更显睿智,眉毛已经没有了,两道眉毛泛着红润的光。105岁的他端端正正地坐在椅子上,给大家讲笑话,一笑就用手挡住嘴巴,“人老了,牙不大好。”他顽皮地说,“我不讲究吃,可是有好东西我要吃。”

“我计算过,用电脑写文章后,我的收入增加了5倍。”年纪一大把的周有光完全跟得上时代的脚步,他知道“谷歌”的纠纷,还差点儿去看了《阿凡达》。用惯电脑的人常“提笔忘字”,他也会忘。

他完全有资格讲古:“我看着私塾变成了洋学堂,从留辫子到剪短发;看着家里从原来的油灯变成电灯,用上了电脑;还有手机,万里之外的人也能跑到耳朵边讲话。这不是过上神仙生活了吗?”

他的妻子张允和80岁时,回忆昔日恋爱情景,写了篇《温柔的防浪石堤》:“两个人不说一句话。他从口袋里取出一本英文小书,多么美丽的蓝皮小书,是《罗密欧和朱丽叶》,小书签夹在第几幕、第几页中,写两个恋人相见的一刹那,什么‘我愿在这一吻中洗尽了罪恶’。这个不怀好意的人,他不好意思地把小书放进了口袋,轻轻地用右手抓住她的左手。”虽然她没有用一吻“洗尽了罪恶”,可从此,“她一生的命运,紧紧地握在他的手里”。

提到这篇文章,周有光笑了:“恋爱的文章嘛,大家都喜欢看。我老伴儿去世前一天晚上,还有朋友来拍照,第二天她就发病去世了。她的心脏不大好,93岁,去世应该说是自然的了。”他始终叫她“我的老伴儿”,质朴情深。

人家看他100多岁的长者,常问他中国的前途怎么样。他说所有的国家都有前途,都是光明的,区别是快一点和慢一点,“我们国家还是发展得比较快的”。



学者风范



人到中年



新婚时期

2 婚姻

有爱有敬才幸福

周有光跟张允和的恋爱经过,是大家很感兴趣的话题。

对此,周有光说:“我和她结婚是偶然的。我老伴儿的曾祖父是清朝大官僚,做过两广总督、两江总督。到她父亲的时候,家里败落了,但还是很有钱。她父亲接受了新思想,跟蔡元培、蒋梦麟做朋友,离开本乡,在苏州办了一个女子中学,直到今天还在。我的老伴儿进这个学校,跟我妹妹同班。她到我家玩,我们很早就认识。我跟她的关系,可以分为三个阶段:苏州阶段,好多人一块出去玩;上海阶段,我们俩往来多了一点;最奇怪的是在杭州又碰到了,杭州风景好,是最适合恋爱的地方,这是恋爱阶段了。后来结了婚,我们就到外国去了。”

在周有光眼中,沈从文跟三妹(张兆和)的恋爱是另一种模式:“他在中国公学教书,给三妹写情书,三妹找到校长胡适,说他是老师还写这些乱七八糟的东西给我。胡适说,他又没有结

婚,向你表示好感没有错。这句话讲完三妹就不高兴,结果胡适第二句话更糟糕,他说我跟你父亲也是朋友,要不要我跟你父亲讲讲?三妹气得扔下信就走了。”

说到这里,周有光大笑起来:“沈从文本事比我大,你不理我,信照样写,你看也好不好看也好,一封一封来。后来到了山东大学,他们终于慢慢好起来。我说沈从文脸皮真厚!我那时候一点不用追,我跟老伴儿谈恋爱是流水式的,他是冲击性的。”

张允和家里很有钱,谈恋爱时,周有光给张允和写信,说:“我很穷,怕不能给你幸福。”张允和的回信有10页纸,大意是说幸福要靠自己创造。在杭州那段恋爱时光,他们过得很有趣,星期天出去玩,不能手牵手,走路时两个人还要隔开一段。“一次,一个和尚跟在我们后面,我们走得快他也走得快,我们走得慢他也走得慢,故意听我们讲话。后来,我们在一大块大石头上

坐下来,他坐在我旁边,问我:这个外国人来中国几年了?我说:来3年了。他说:怪不得她中国话说得这么好!哈哈,我的老伴儿鼻子比普通人稍微高一点,他以为她是外国人!”

周有光认为,金钱对婚姻来说,可以说是重要的,也可以说不重要。婚姻恋爱本来跟经济没有关系,可在这个社会里,人不能没有钱。许多人为了钱结婚,也有人为了钱闹离婚,这不是钱本身的问题。他主张恋爱不仅要有爱,还要有敬。许多人离婚是因为对对方没有敬重之心。既有爱又有敬,婚姻会比较圆满。“我跟我老伴儿结婚70年,美满70年。有人问我们家保姆:他们吵架吗?保姆说不吵架。其实也吵,但都是两三句就吵完了,不会高声大嗓地让保姆听见。吵架都是为别人的事,不是为我们两个人的事。我对什么事都是持乐观态度,加上我既要爱又要敬的婚姻观,我们很幸福”。

3 视野

要从世界看中国

古,以为古代好现在不好,这是错误的。社会是进化的,我们要继承古代的东西,也要有所创新,这才是正确的复古态度”。

在研究语言文字学时,他发现中国在这方面有很好的传统,但也有缺点,就是只研究中国不研究外国,只研究古代不研究现代。在他看来,新时代语言文字的许多问题其实从清朝末年就开始了,古老的语言文字跟现代化不能配合。因此,他专门写了《汉字改革概论》,把人们的感性认识提高到理性认识,把文字改革跟现代科学挂钩。

“我做研究有这种视野——必须从世界来看中国,不能从中国来看世界。比如提出一个问题:汉字在世界历史上占什么地位?这个问题很重要,我从1950年代开始研究,一直到80

多岁把它写成书,叫做《世界文字发展史》。”说起做学问,周有光滔滔不绝,“前两天,我看到一本《许倬云访谈录》,里面有一段话说得很对,大意是过去我们讲爱国,在如今全球化的背景下就不能这么笼统地讲了。法国人爱法国,德国人爱德国,于是打了两次世界大战。我们现在要爱人类,从爱人类的角度来爱国。我最近写了两篇文章稍稍提到一点,出版社说写得太急了,不知道读者能不能接受得了。文化不分国家,我们要从世界看国家,不能从国家看世界。”

常有人问周有光:你105岁了,还能写文章,有什么长寿之道?他说:没什么长寿之道,只是因为上帝太忙了,把我忘了。幽默天性尽显无遗。

(据《南方人物周刊》)